

散文 第二名 劉天浩

筆名/雙刀劉

個人簡介：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二年級

屏東人，2001年生，只會寫小說但不太會寫小說，曾獲大武山文學獎、西灣文學獎、香港青年文學獎與其他文學獎，現為「擦亮花火」文學計畫成員。什麼東西都想寫，什麼事情都想做，還在等一本自己的書。

他鄉

家裡的冰箱有一片海，那是母親的海。

每次我回到家，母親總會端出一鍋湯，那鍋湯叫不出名字，但凡當季的、便宜的就往裡頭攔，偶爾放些魚蝦，水滾後加點鹽，就是一道無名之湯。

母親說，這些魚蝦，已經是最後一批了。母親低著頭，表情看不出任何情緒，「以後再也吃不到了。」

那些魚蝦，如果活著，如果順利長大，如果自由，牠們會在東里溪的支流中。但湯裡的魚蝦，都是來自汕頭的養殖魚塢，被縮小的生活，日復一日在一方天地重複著。

跨越海洋的日子裡，母親在一家超市做麵包；剛到臺灣的時候，人生地不熟，母親什麼都不太會。每天騎腳踏車趕早上八點的班，然後揉很久很久的麵團，回家的路上揀幾把菜，再出去擺攤。

從我很小的時候，母親下班回家時，總會買一張威力彩，不是為發財，只不過是想在平淡的生活中，在千篇一律的日子裡，有個盼頭。

母親看到的世界，是很淺的。

母親的世界，比較小的是飯桌，比較大的是家；比較近的是屏東潮州，比較遠的是廣東汕頭。

母親足跡很淺，卻走得很遠。

母親回家，足跡長達406公里。我曾跟她一同搭最早一班車、最早的班機前往廈門，搭大巴或動車往饒平，最後到達汕頭，踏上她曾草根般深植的土地。步下動車，四周燈火閃爍，我拖著沉重的行李，潮汕話在周圍嘈雜，此時列車的光映在她臉上，我與母親四目交接——

頃刻，我擁有了母親的眼睛。

—

上次吹到汕頭的微鹹海風，兒子還沒長那麼大。

潮汕的家屋都是同個樣式，姥姨管這叫做四點金。從外頭看很像四合院，

四面以房屋圍合而成的天井小院，門邊上的春聯被風雨磨成啞紅色，鐵窗欄也鏽了，那四四方方的天井，把陽光綿軟地鋪在稻埕。然後，農人來來往往，用耙子翻穀，梳理出一條條的痕跡；然後，秋聲瑟瑟，我與阿母坐在紅木長凳上，一隻隻草魚出來挑，大的挑去市場賣，小的拿去曬成干；然後，陽光篩過頂樓的篩網，光影茫茫渺渺，投在地上，好像草魚的鱗。

阿母坐在長椅，汕頭廣播電視台上賣的雕花樣式，收音機播鄧麗君，角落裡有一隻貓，靜靜地熟睡。

在那個四點金的頂樓，種著好多不知名的花，阿母手把手帶我一個一個認。夏日的午後，整個頂樓濕濕的、暖暖的，瀰漫魚蝦的腥味。

我國小輟學，小時候騎車腳斷了，就沒再繼續讀。一開始在毛紡廠工作，我負責車襯衫的鈕扣，做到香港回歸後，改做彩繪玩具，彩繪塑膠松鼠、水果。嫁來台灣後，做最久的是做麵包，在連鎖超市的麵包坊揉麵團。

家裡換過三隻貓，第一隻貓很聰明，會幫忙遛鵝，後來死了。第二隻貓是外頭跑來的，阿母在電話裡說，曬魚的時候牠都偷吃，之後又跑了。第三隻貓好好養著，八八風災那時，長途電話都是電波雜音，雜訊中依稀聽見大嫂說貓死了。

我是家裡最小的女兒，什麼人都疼。記憶中，阿母燒魚的時候，熱鍋冒著白煙，廚房裡什麼東西都是滾燙的；來到台灣後，幾百度的烤箱，不過是稍熱而已。

阿母說，我從小筷子就拿得高。

上次回家是十年前，有些東西都變了，中央政府徵收土地，說是要把道路拓寬，祖厝前一整排房子全打掉，連同哥哥開的藥房也沒了。一幢幢屋宇相連的「蟻氏祖厝」，下山虎、四點金、駟馬拖車、五間過，灰色的石棉瓦滴著水，不遠處曬穀場旁坐立潮劇戲臺，密密麻麻的街弄衢巷裡，貼滿了治療花柳病的廣告傳單。

阿母的腿腳不太方便，總是躺著，走一段路就很痛很痛，吃了哥哥的藥也不見好。彼時，阿母躺在長椅，睡得很熟，她的右腳微微腫脹，擱在扶手上，我按壓腳踝一下，皮膚凹陷出一片指尖的印子，久久沒有浮上。阿母的右腳，就像是兒時趁父母不在偷玩的鞭炮，彷彿有條引線隱隱焚燃。

這件事情，悄悄地成為一個秘密。

阿母教我認的那些花花草草，到台灣後，大部分都改了名字，有些還認得，有些認不得了。台灣的糖漬楊梅，沒有廣東的好吃，小小顆的、酸酸的，籽很大，澄海人把很甜的楊梅形容為「死父甜」。阿母教的家常菜，也叫不出名字了，食譜口耳相傳，飄洋過海時變了味也未可知，一切都在奔波中死無對證。

或許，很多事物都像家常菜，一入家庭便失去了名字。

動車駛去，周遭漸靜，彷彿只剩我與母親二人。

母親望著我，緊握我的手。她說，這次一定要帶你來看看外婆。

兒時同母親逛夜市，我不懂事，嫌母親的手心悶熱，便甩開她的手自己逛，母親手一空，我也消失在人海裡；一轉眼，我沒了，也找不到。少時母親提起這事時，我總倔強地說，都是你的手太熱了，我才會甩開，而且我自己能回家。那些過於敏感的自尊，在煩膩的關切下表露無遺。

從此以後，我跟母親出去，她總是要緊握我的手。她是多麼害怕失去，她需要我，勝過成人那些冰冷掌心。

母親總說不清楚外公是做什麼的，只說阿公很會賺錢、很聰明，在水利局工作，養魚養蝦，她一頭烏黑的髮皆是拜吃魚蝦所賜；家裡的每個人，都很聰明。她把一幕幕烙在腦海，可待轉述之時，卻失焦地，絮語崩塌。

高一那年，第一次瞥見故事的全貌，外公很清瘦，擁有海人們都擁有的黝黑面孔，長滿厚繭的食指與中指間夾著一根長壽菸，大拇指尖端斜倚在菸頭，他看向我，說我聽不懂的語言。我下意識地憋氣。

吃飯時，外公會點上一根菸，吞吐白霧，與他烹茶的水霧混為一體，裊裊上升。母親豪邁地與他笑鬧，從行李箱掏出機場買的中華菸，外公揚起嘴角，把菸按熄，接過那盒中華菸。

廣東的男人都是得抽菸的，菸是男孩蛻變為男人的證據。

桌上擺了幾樣菜，炒花蛤、辣竹蛭、清蒸白鯧、海瓜子。母親添飯，外婆眼角堆滿笑，對我說話，她試著說國語，然而那些話飄到嘴邊，忽然都失去了形體，我敷衍地假裝聽懂，以固定頻率點頭；外婆伸出她皺紋的手，夾了不知名的菜到我碗裡，同菸味一般腥，我用極不標準的潮汕話說了謝謝。外公枯瘦的、滿布斑點的手托著碗底，青灰色的血管在他手背，像枯葉的葉脈般歷歷可循，顫抖地給母親夾菜。

此時，茉莉花在我身後，飄來一縷清香，我想起臺灣的家也種有茉莉花；多年未歸的母親，是否在每次茉莉綻放之時，都會想起遠在故鄉的父母？母親是否惋惜，子女拖累她，使她不能常去探望父母？母親是否有一絲絲悔恨，哪怕只有一絲絲，在心底深處譴責自己未盡義務的不孝？

從小她通長途電話就喚我聽外公的聲音，她教我用潮汕話祝阿公「生意大賺」。外公的魚塢裡養著草魚草蝦，在離蟻氏祖厝幾公里遠的地方，四周只有泥巴路。表哥帶我去的時候，剛下過雨，泥巴路上滿是泥濘，機車騎到一半就發不動，天上一顆星都沒有，黑漆漆的，周圍的草很高，風吹過的時候發出沙沙聲響，像身處曠野漂流，黑暗羊水通身包裹，只有靜謐的、到達不了的彼方。

我與外公、與母親，終究還是鴻溝似的無法靠近。

離開汕頭前夕，趁玉兔颱風還沒來，我、母親、外公去了一趟汎洲島，母親在講「汎」這個字時，可能是因為潮汕話的發音，她沒辦法標準說出口的聲音，她會說成「信」洲島，在汕頭，人人都說信洲島。

渡船泊在岸邊，付兩塊錢人民幣就可上船，那天很悶熱，飄著微微細雨，外公縮進船上遮雨棚的身軀，變得好小好小。我坐在船側最外邊，工人丟進來幾袋麵粉，船因為重量不平衡而有了些許晃動，外公看我，我倆沒來由地相視而笑。渡船很簡陋，僅有固定在船側的木板凳，船夫握著舵（那艘渡船只有舵能控制）並拉動油門，船緩緩啟動，帶著我們繞過窄小的水道，遠方柘林漁光照在水面。那些燈火，曾經如此靠近，而後如此遠離。

外公在海風中點菸，火花一下就熄滅，船到彼岸，外公放下手中的菸。汎洲島的海灘很多垃圾，還有碎裂貝殼撒在沙灘，母親緊握外公的手，小心翼翼地帶他越過尖銳處，避開那些危險，通往平坦柔軟的地方。

母親一直是這樣的人。

只是我遲遲無法理解母親，如同潮汕話之於我。

島的最後，母親把外公留在彼岸。前往機場時，母親往車窗後方不斷揮手，直到再也看不見外公身影。行李箱裝滿魚乾蝦乾的塑膠袋發出沙沙聲響，就像汎洲島的海一樣，歛去了島的孤絕。

潮起潮落，終歸無聲。

再次聽見外公的消息，已是肺癌末期。

小時候我想要買玩具，母親說，之後再來買。來不及了。很多時候生命中那些遺憾，像在未知的某處撞到的瘀青，隱隱浮現，成為那不時提醒的痛。

母親說，我什麼都不會，只會騙小孩子，怎麼辦，以後媽媽就沒有爸爸了。母親在我面前露出脆弱的樣子，我不知道那是代表我的成熟，抑或是她的遠去。外公過世那年，剛好是新型肺炎爆發的一年，邊境封關，口罩不得出口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如幾年前的泥巴路，難以行走，漆黑得看不見未來、看不見光，那些黑暗，將我與母親通身包裹，像羊水一般，等待疼痛分娩。

別時茫茫，阿公的長日盡處，母親來不及緊握住他那枯瘦的指尖。

彷彿是真正地被留在了彼岸。無法奔喪、無法寄信，每一次等待都杳無回音，把母親的悲傷拘在此岸。從小沒讀什麼書的母親，第一次面對這無法預習、無法複習的題目——父母的死亡，我們永遠不會準備好。母親不太會寫字，寫的字癱軟潦草，教導我的事總是含糊不清，在她不善言詞之下，我不知道母親怎麼宣洩那些過於深沉的悲傷；我只希望，母親能平靜地安放悲傷。

以愛之名，不用生意大賺，只願你身體健康。

家裡的冰箱有一片海，那是母親的海。曾經乾枯，曾經滄海。

那些帶回來的魚蝦，再也吃不到了，因為外公不會再去魚塭撈魚了。母親看著她與父親合照，說：「總有一天，你會離開我，無論未來你如何，你只要記

得我、你只要記得我，這樣就好。」

淺淺一句，就好。

我捧著那碗熱湯，記住最後的滋味。我與母親看著窗外，誰也沒有說話。